

#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甲卷）

## 文综历史试题

### 史料来源和试题解析（选择题部分）

鲍鹭滨史料汇编团队 鲍鹭滨 卓银化 许毅峰

24. 汉晋时期有多种文本记载，帝尧之时，“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戏，围观者称颂帝尧。老者歌云：“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上述记载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最接近
- A. 孔子                      B. 老子                      C. 韩非                      D. 墨子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中国古代某一思想流派评述为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上述记载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最接近”，是通过题干情境信息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

#### 史料来源 1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先秦】佚名《击壤歌》

译文：太阳出来就去耕作田地，太阳落山就回家去休息。凿一眼井就可以有水喝。种出庄稼就不会饿肚皮。这样的日子有何不自在，谁还去羡慕帝王呢？

#### 史料来源 2

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同情心。孔子曾对“仁”下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定义，他的学生则将孔子的为人处世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都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

人文主义精神。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可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做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其他道德范畴如忠、孝、节、义、信、廉等，在孔子看来都具有局部的意义。

孔子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压榨，而主张惠民、富民。他还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期望恢复西周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也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42—44页

### 史料来源 3

墨家是继儒家之后较早出现的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战国时之显学其创始人墨子，名履，是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他的思想较多地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墨子提倡“兼爱”，即无差别的爱，反对儒家有层次、差等的“仁爱”，由此又主张“非攻”，谴责列国的兼并战争。关于政治，墨子提出“尚贤”，希望上自天子、下到乡里的各级职务都选拔贤人来担任，在“尚贤”的基础上又提出“尚局”，即所有人都要自下而上服从领导，直至“上同于天子”。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他主张“节用”，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和礼乐建设，认为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世界观则强调尊天、尊鬼，迷信色彩较重。墨子的信徒人数很多，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带有宗教和苦行的色彩，在战国社会上影响相当

大。但作为墨子、墨家社会政治思想核心的“兼爱”学说，具有虽崇高而不切实际的弱点。随着墨家部分观点在后世渐被儒家所吸收，它作为一个学派也就基本趋于衰落了。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第61页

#### 史料来源 4

真正对新兴王朝政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是韩非。韩非是战国法家的后期代表人物，也是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韩国贵族，早年曾受学于荀子，内口吃不善游说，埋头著述。秦王政读了他的文章大为赞赏，误以为是古人所作，恨不与之同时，了解真实情况后遂发兵攻韩，迫使韩非入秦。韩非的同学李斯先已在秦任官，他害怕秦王政重用韩非，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秦王政面前进谗言，致使韩非下狱。韩非在狱中被迫自杀。韩非虽死，但他的法治思想和君主专制思想却得到了秦王政的赏识，被充分贯彻于秦朝统一前后的政治实践当中，并对此后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生了久远的影响。

韩非系统地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更加全面的法治理论。韩非对法的解释是“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他强调，法令公开颁布以后，就要认真执行，做到“动无非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这样即使是中材的君主，亦足以为治。在韩非看来，只有严格以法治国，才能尽可能地发挥出国家机器的统治效能，调动出社会上下各阶层的积极性。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更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百姓“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如此才会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这主要是继承了商鞅学派的思想传统，但阐述得更加充分。

在重法的基础上，韩非又将“术”的思想大力发挥。他指出，作为君主驾驭臣下的权谋，术的重要性决不下于法。“君无术则弊于，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与法的公开性不同术的特点在于其秘密性。“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一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因韩非对“术”的阐释建立在极端性恶论的思想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天下人无例外地都是“挟自为心”的自私自利之徒，彼此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以外再无其他原则可言，所以君主不能信任、依赖身边任何人，只能靠“术”来防奸。韩非认为，君臣关系就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甚至说“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因此他概括出了臣下对君主行使奸谋的八种主要手段，又为君主设计了“七术”、“六微”、“八说”、“八经”等一系列防范包括鼓励告密、设置特务布置圈套、借刀杀人等等。总之，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韩非已经完全不承认伦理道德的调节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剩下阴谋和暴力。这一点与荀子性恶论有着重大差别。

韩非发展了慎到关于“势”的理论。他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又再强调“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在韩非的思想体系中，势实际上成为贯彻法、术的先决条件，君主不仅要善于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自然之势”，更要有意识地集中权力、用严刑峻法创造“人为之势”。因此韩非极力拥护君主独裁、专制。不仅如此，他还将“势”的原则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思想领域，主张严格控制思想舆论并使其定于一尊，禁止私人讲学和私人著作传布，为此不惜采取愚民政策。“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实际上已经带有强烈的仇视文化知识的心态。

从哲学角度看，韩非思想中的辩证法内容比较引人注目。今天常用的“矛盾”一词，就是由韩非发明的。这些辩证法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但与老子较多地强调对立面转化关系不同，韩非更重视对立面的冲突、斗争因素。所以他不像老子那

样主张柔弱胜刚强，而是贵刚不贵柔，提倡积极进取。在论述具体问题如政治时，他又往往走得更远，将对立面的冲突、斗争绝对化，提出的策略带有很强的偏激、冷酷色彩，缺乏回旋余地和灵活性。这些策略在秦王朝大都得到了实践，结果却成为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然而，韩非的思想毕竟为新出现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王朝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其中亦颇不乏实用的内容。因此，在秦亡以后两千年中，后代王朝的统治政策大多是“阳儒阴法”、“儒表法里”，关键仅在于不公开声明而已。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70页—72页。

### 引证材料 1

法家代表韩非子，则可说是把人性本恶的论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看到了“当今争于气力”的现实，认为即使是君臣父子，其间的关系也都是充满了利己主义的打算。父母对子女，是用计算之心相待，君臣之间则不过是一种买卖关系，“君臣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所以韩非子真是把人与人之间脉脉温情的关系，置于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可以说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先驱。他主张君主要把法（法律）、术（驾驭臣下的手段）、势（君主的权势地位）三者结合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家这一派的学说有许多方面符合当时历史的需要，在国家统一的事业上曾经发挥过作用。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四章，第202页

### 引证材料 2

法家认为，百姓所憎恶的严刑峻法乃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惟一方法，而百姓就像是挑破脓疮时号哭的婴儿一样不省利害。法家对先王之道也不抱迷信，认为时代不同了，

解决为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百姓都是愚蠢的自私自利者，而官吏则各谋私利而难以信赖，因此统治者不能依靠人的道德，而是必须通过奖惩（换言之，即严峻的刑罚）来进行统治。对人的评价不能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其行为的最终结果。失职者必须惩办，须等于百姓实施“连坐”之法，对谋逆行为知情不报者以同罪出发。如果实行严刑峻法，百姓自会安分守己，而刑罚最终也就会消失了。

法家认为，**权利仅仅存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尽管法家反对君主世袭以外的任何世袭制度，他们却认为宗教承袭和法家思想一样，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而统治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为此，商人、儒士等“**五蠹**”必须驱除。生活中各个方面必须尽可能以富国强兵为旨归。

法律是西方文明的骄傲，而法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来却一直名声不佳。这是因为法家的法律观念远未达到古罗马时代的成熟程度。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则唯恐避之不及

尽管受到后世的指责，法家思想对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的建立及其首创的帝国体制，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后世出现的大一统制度与严苛独断的统治也能从中找到部分原因。

——摘编自【美】费正清著 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三章 第62—63页

## 史料来源 5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庄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

地位仅次于儒家。道家总体来说是一种**退避**的哲学。……道德论者与统治者一道迫使大众服从社会规范，道家大力鼓吹个体的独立性，认为人唯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与天（自然）保持一致。这种自然就是“道”。……“道”尽管不断变化，但本体却是一样的，并无大小、善恶、生死的区分。万物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道家的主要观点，……道家认为，“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做事顺其自然。……人类干预或改造自然就会破坏这种和谐并产生混乱。……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这样一种原始、消极的社会中“无为而治”而天下“至治”。

道家思想其实正是对中国主流文化而言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儒教的道德伦理及其个人服从社会的强调更是束缚了人的心灵。相反，在道家思想中个人能够真正地展现自我并自由地抒发性灵。……一个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是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是积极入世的官吏，入夜却变为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

——摘编自 【美】 费正清著 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章第，55—56页

## 引证材料

约自战国中期起，开始形成道家学派。这一学派的两部代表作《庄子》和《老子》。《庄子》书中主要思想是战国中期的庄子的。老子其人是谁，司马迁写《史记》时并存三说，已难断定。《老子》一书晚于《庄子》，这大概是无问题的。《庄子》和《老子》都从当时历史看出一种矛盾现象：**知识和技术越进步，人们之间的争斗也就越诡诈，越野蛮。他们都主张使人们回到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以解除当时的激烈社会矛盾的斗争。道家主张君子“无为”，这样人民就朴实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无不为”了。**《庄

子》和《老子》也有不同之处：《庄子》倾向于逃避现实，以保全自己；《老子》则主张以柔克刚，倾向于以退为进。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十一章，第342页

### 综述材料

总起来说，先秦诸子的思想，大都把原来宗教性的天还原为自然的天，从天道远、人道迩的认识出发，重人事而轻天道，这样虽然脱却了宗教迷信的许多束缚，但却疏忽了对客观自然规律的探求。他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其基本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无论他们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复古论，还是进化论，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命运，都持乐观的态度，为实现他们理想的王道、霸道、统一、太平、大同、小康等而奋斗不息。无论他们主张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他们同时都倡导乐观进取的人生，要用各种手段使人类走向进步；而所谓“无为”的思想，实际也是倡导“无不为”的。这就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和伟大思想创造，是对人类精神宝贵的伟大贡献。

——摘编自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三章 第239~240，241~243页

### 小结

先秦诸子百家面对动荡变革的时代，站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立场，提出了自己视角迥异的政治观点。儒家以孔孟为代表，以德治、仁政为治国理念，希望重归于周王制下的“礼乐文明”；道家以老庄为代表，表现出相对消极遁世的倾向，主张“无为而治”，力主恢复原始自然的质朴社会状态；墨家主张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为主要政治理念，代表了下层民众的政治呼声；法家则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建

立中央集权的威权君主，以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来整合国家秩序。虽然政治主张不同，各为其主，所属势力集团屡变，但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树起“学而优则仕”，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兼称显学。他们还派遣弟子直接拿起武器，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政治专制为自己的全部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化活动中，导演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即使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归隐，也只是在实现自己政治理论无望的时局下，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扭曲表现。

### 史料分析

从题干的关键信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可知，老者的心理体现出一种生产生活不受国家政治生活影响的态度，与道家的“无为而治”，使民无知无欲的政治理念相接近，B项说法正确入选。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A项不符合题意排除；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政治主张“兼爱”“非攻”，不符合题意排除；韩非子主张“法术势”结合，主张加强中央集权，D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史证等关键核心能力。学生需要调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核心思想的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25. 西晋至唐初，皇子皇弟封王开府，坐镇地方，手握重权。唐玄宗在京城专门修建一座大宅邸，集中安置诸王，由宦官管理，称为“十王宅”，又仿此建“百孙院”。此后，唐朝沿用该制度。由此可知，唐后期对皇子皇孙的安置

- A. 削弱了藩镇势力
- B. 强化了分封体制
- C. 凸显了专制集权
- D. 动摇了宗法制度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主要以唐朝时期设置“十王宅”“百孙院”的设置为情境，从设问的表述“唐朝后期对皇子皇孙”的安置，是通过材料分析考查这一做法的根本目的。

### 史料来源 1

帝王之家，子嗣兴盛是国运昌荣的象征。玄宗有子三十，九子早夭，次子瑛为太子。诸子年幼时也应随母而居，成年后如按旧制出阁，则赐宅、开府、就藩即可，可在开元十三年皇权集中过程中，出阁制已形同虚设。故在参照已有布局后，玄宗遂以十王宅落成成为标志，对诸子实施了不出阁制，玄宗子孙的生活和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十王宅外置百孙院。十王宅建成后，诸王子女快速繁衍，如棣王有子女五十五、荣王子女五十八、延王子女三十六。在诸孙达到一定数额后，“十王宅”内已难以容纳，玄宗只得从“十王宅”中剥离出了孙辈们的聚居大宅“百孙院”。分设百孙院的具体时间不详，从“外置”可推知建于“十王宅”外。十王宅位于长安城的东北角，北部与东部墙外有夹城，故十王宅内人上可进大明宫，下可入兴庆宫，位置十分便利，这也是玄宗的用意所在。因此说它是宗室管理制度的分水岭。

——摘自陈丽萍：《再议唐“十王宅”制度》，《中国史研究》，

2022年01期，第106—107页

## 史料来源 2

西周时期施行的分封制，进一步强化了宗法制、井田制和等级制，巩固了新生的西周政权，为西周国祚的延续产生了积极意义。同时，也应看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分封的诸侯独立性较强，在周王实力衰弱的情况下，各诸侯国“藩屏周”的作用逐渐丧失，而且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导致中央王朝失去了对地方诸侯的有效管理和实际控制。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和战乱，就是分封制这一制度弊端的展现。分封制对“大一统”的国家统一极易产生隐患和威胁，破坏社会秩序的团结、稳定，导致国家社会秩序崩塌。

——摘自刘家书：《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阴山学刊，2020年4月，第33卷第2期，第73页

## 史料来源 3

春秋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已开始瓦解，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式微，以下凌上、僭越礼制的现象普遍发生，天子不复巡狩，诸侯不朝觐纳贡。到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出现，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等等，这些都冲击着家国同构的统治体系。周初分封的71国中，姬姓国53个，而战国七雄中有6国是异姓，只有燕王室为姬姓。秦汉以后，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政权与族权进一步分离，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之外，各级权力机构官员的任用主要是通过体现“尚贤”原则的各种选拔制度，而不是体现“亲亲”原则的皇族血缘纽带。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宗法制影响的消除，而是从客观上促使宗法制变换形态。秦汉两朝采取法律和强制性的手段对各地强宗巨族进行打击，使宗法制残余势力很快衰落了，原有的宗族制度已被打破，聚居的宗族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宗族组织。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宗法性豪强势力崛起，形成宗法性门阀世族。这些宗族组织对当时社会秩序有较大影响，如影响地方政府行使权力和地方选举，宗族武装发展

较快，地方独立趋势增强，有的还公然与政权公开分庭抗礼。隋唐两代以庶族地主为统治基础，打击豪强门阀，使宗法性豪强势力迅速衰落，再经过黄巢起义军的扫荡，宗法性豪强势力销声匿迹。宋明以后，宗族制度亦日趋完善，并表现出新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摘自姚为君：《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第41卷第3期第89页。

## 小结

西周分封制崩解后，并不意味着血缘宗法关系的彻底消失。吕思勉先生就曾经总结过，中国“封建时代”（即秦到清两千年的专制帝国时代）出现了数次分封制的“反动”。这些专制时代的分封本质上同西周时代的分封体制已然迥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家国同构下以血缘为政治传承只剩下帝王一脉，地方上的贵族政治更多为官僚政治的“选官制度”所取代。其次民心向背很大程度可以决定帝王家国祚的鼎革，再无出现周代这样“享国八百载”的绵长国朝，一般大一统王朝都难以跨越三百年的兴衰宿命。因此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对皇子皇孙的制度规范是显得尤为重要。西汉和西晋都出现了分封诸王叛乱导致的政治动荡，因此唐代在对外宗室子弟的管理上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十王宅制”等将宗室子弟集中于京城居住，方便统一管理，一定程度防范了前代宗室成年后外放就藩导致的地方割据的威胁，有利于加强专制集权。后世明代的宗藩制度又重蹈覆辙，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改变了太祖分封诸子就藩镇守的成规，大大削弱宗王的军事实力，逐渐将宗藩诸王变成圈禁一隅、混吃等死的国蠹蛀虫，优厚的宗室待遇刺激了藩王府邸人口的大量繁衍，皇室玉蝶人丁爆棚，大量国家财富耗费在圈养宗王子弟上，逐渐掏空了国家库藏。两百年后，大明帝国在“甲申国变”中轰然崩塌，朱明皇族几近灭族。

## 史料分析

从材料的主要信息可知，西晋到唐初对于皇族的安置措施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晋时期对于皇族采取分封的措施，这些皇族在地方手握重兵，权势较大，严重威胁到了西晋的中央集权制。西晋的这一做法后来引发了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唐玄宗之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皇族的管辖更为严格，通过设立十王宅、百孙院将皇族置于皇帝的身边进行管辖，有力地加强了皇权，利于巩固统治，C项说法正确入选。唐朝后期对于皇族的管理利于加强皇权，而唐朝在地方设置节度使，在一定时期加强了唐朝对边疆的管理，长此以往，节度使逐渐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唐朝中央集权的加强，A项说法错误排除。分封制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稳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唐朝对于皇族的管理进一步打击了分封体制，B项说法错误；严格意义上说宗法制度在春秋之后逐渐瓦解，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宗法制度以全新的姿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D项说法排除。

## 素养考查

本题以唐朝时期加强君主专制的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史证等核心素养。通过调动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制度，分封制、宗法制以及唐朝时期加强君主专制的有关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26. 宋朝海外贸易中，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漆器、铁器等，输入的商品以香料、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等为大宗。政府每年从海上进口贸易中获利颇丰。这表明，在宋朝
- A. 进口商品成为基本生产资料                      B. 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 C. 外贸成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                      D. 手工业生产较为发达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宋代海外贸易输入、输出商品的类型为情境，从设问“这表明在宋朝”为设问，考查宋代的时代特征。

### 史料来源 1

宋廷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财政危机。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海外贸易看作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如宋神宗明确指出：南汉王朝的富强与发展海外贸易有关，“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所以从太祖开始就重视发展广州等地的海外贸易。宋朝对进出口货物实行禁榷制度，并通过市舶“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赚取了巨额利润。“皇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是北宋的第一大贸易港，海外诸国商船多集中在这里贸易，号称“宝货雄富”北宋对外贸易港口的增加与繁盛反映了我国古代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路对外商道已让位于东南海道。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是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南宋时，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为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外贸易的增多反过来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商品经济比内地大大活跃起来。绍兴七年闰十月三日，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海外贸易利润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积极实施。绍兴十年夏四月丁卯，上谕大臣曰：“广南市舶，利之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万缗，皆宽民利

也。”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壬午，上曰：“朕尝问闾舶司岁入几何？闾言岁约二百万缗，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驻赋之外，宜复取户部收支实数以闻。”可见当时的市舶收入高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摘自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1月，第1期，第102—103页

## 引证材料

宋代的海上贸易更为发达，进出口商品见于记载者达数百种，出口以丝绸、瓷器、茶叶、粮食、药品为大宗，进口则以香料、象牙、硫磺、木材大大宗。为了统一管理海外贸易，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设立了市舶司，外出船只需提出申请，由官方出具证明，出口商品还需经过检验，依例纳税，然后放行。外商船只来到中国也要申报，请市舶司官员上船检查人员和货物，收取税款，同时还得让他们优先购买商品，然后才能允许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宋代市舶司的税款收入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在北宋时每年达到50万贯左右，南宋每年更增加到200万贯左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七章，第308~309页

## 史料来源 2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的贸易往来，《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记载黄门设“译长”，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糴而往”。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及至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至明清时期受海外贸易政策影响则又出现

了新的特点。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海外贸易中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连同由海外地区输入的香料、珍宝等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线路。这条海上线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特征，也即是被后世所称与北方陆路交通线路“丝绸之路”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

——摘自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十一》

2020年9月，第380页。

### 引证材料

两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 小结

两宋王朝在对外贸易中设置市舶司，利用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欧亚商道的繁荣，并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关税收入。但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可以看出，中国输出的多是长期对外热销的中国优质的手工制品，而进口的大半是奢侈消费产品，客观而言，这种贸易依然是传统自然经济的产物，此种官方贸易体制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成为朝贡贸易体系，阻碍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束缚了新经济因素的成长。

## 史料分析

根据题意可知，宋朝时期政府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重视海外贸易发展可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另外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海外贸易税收成为两宋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C项符合题意入选。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朝时期就已开辟，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B项说法错误排除；宋朝时期进口的商品以香料、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等为大宗，这些商品主要为奢侈品，并非基本生产资料，A项说法错误排除；材料无法体现宋朝时期手工业发达的情况，D排除。

## 素养考查

本题以宋朝进出口商品的明细为情境，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等核心素养，调动宋朝时期商业、海外贸易、手工业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知识，结合题目具体情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27. 康熙年间，多次令各地举荐山林隐逸，又令官员推举博学鸿儒，吸收学行兼优之士。开设明史馆，召集文人编纂明史，还进行多部儒经传注的修纂，编成《康熙字典》。上述措施的主要目的是
- A. 承续华夏传统 B. 倡导疑古辨伪 C. 弘扬程朱理学 D. 保存历史文献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康熙年间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措施为情境，从设问“上述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考查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

## 史料来源 1

清朝入关之后，采取怀柔与迫害相结合的统治政策。清朝入关后，统治者对于汉族官僚采取笼络的政策，对于原来明朝官僚“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各衙门的原来官员都照旧录用。并且规定六部、内阁等中央机构实行满汉官员并设的机制。此外清廷还采取其他

措施，把汉族知识分子吸纳到政权之中。除了不断扩充科举的录取名额外，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召举“山林隐逸”，一些地主士人不经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官。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又开设特科——博学鸿儒科，给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名士以更大的优厚，一经录取，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同时清政府还组织大量人力编纂各类型的书籍，对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和控制。

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清政府也给予种种封爵和特权。如对维族的各种“伯克”，其初皆准其世袭，乾隆中期岁废除世袭，但通过参赞大臣的奏请或直接补用，仍可保持其特权。在西藏，清朝统治者加封班禅、达赖为最高首领。清王室和蒙古贵族的关系更为紧密，对蒙古贵族授予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这些爵位都是世袭的。同时清廷还与之保持着世代联姻的关系，以联姻来巩固整治上的友好。清廷利用这些手段来增进相互间的情感，使各族上层对清廷“畏威怀德。弥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从而起到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作用。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对各族上层进行笼络的同事，还努力加强思想文化上的控制。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进行思想上的诱导，另一方面对于不利于统治的言行进行严厉牵制。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著：《中国古代史》，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5版，第311—312页

## 史料来源 2

清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实现一统的封建王朝，其特殊性在于清统治者的非汉族身份。“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建构不仅是依靠统治者的魅力、宗教力量的护佑以及官僚政治的运作，还需要文化秩序的建设、认同”。整体而言，清初文化政策与秩序的整顿主要呈现为满汉文化之间、权力上层与普通士人之间不断地角力、渐习到角力、融合的过程。

程。其文化的角力主要表现为：顺治初期的雍发易服令，呈现突出的以夷变夏倾向。顺治十六年（1659）以“畔道驳注”为口实的焚书、康熙年间的庄廷鑑明史案、戴名世案等文字狱大案，是清廷基于统治合法性的本能自我保护与防御而施行的文化高压；康熙初叶圣祖亲政之前，以鳌拜为首的顽固派施行的回归“淳朴旧制”，是清初文化政策上的一次短暂的全面倒退。其文化的渐习与融合主要表现为：顺康年间的文化高压与以夷变夏短暂的空隙之间，以及圣祖亲政之后，清廷曾推行系列的“渐习汉俗”与“崇儒重道”等文化政策，以重整文化秩序。诸如顺治初年（1644）、二年（1645）颁布与恢复的科举取士制度，顺治八年（1651）举行的“临雍释奠”，顺治十四年（1657）举行的“经筵盛典”，康熙九年（1670）提出的“文教是先”治国纲领，重开日讲，每年春秋两次的“经筵讲学”，康熙十七年（1678）颁谕开科的“博学鸿儒”等等。文化政策的怀柔与重整表现在图书访求与编纂方面：史学方面，顺治二年（1645）始议编纂《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重开《明史》馆，撰成《三朝实录》《太祖太宗圣训》《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等；经学方面，先后撰成《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图书编撰扩及学术领域，促成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官修图书问世，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律历渊源》《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等。道统承续方面，顺康两朝由尊孔到尊朱，借用理学以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尽管遂后“政治权力就相当巧妙地垄断了本来由士人阐释的真理，并使帝王的‘治统’兼并了‘道统’”，但历经几次反复，初步建立起“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摘自姜维枫：《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9月第5期，第34—35页。

## 引证材料



**圣祖康熙**（1661—1722 年在位）与汉族士大夫阶层关系很好，这有助于他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胜利。康熙本人精通儒家经典，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康熙于 1679 年开设了明史馆，网罗了 152 名大学者编撰明史。另外他还开设博学鸿词科。在宫中收罗了一大批汉族学者和书画家为皇家服务。康熙在位期间还令人编撰了《康熙字典》、《朱子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后者远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更加卷帙浩繁，**

**有 5000 卷子之多）等书。**这样，这位满洲皇帝也和明代皇帝一样，成了文化学术的热情赞助者和保护人。

**管理全国各地的百姓不仅需要刑罚威慑，同时也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清代全国各地都设有官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国子监和各地学堂则传授儒家经典；年高有德者可以得到官方的旌表嘉奖，地方神灵一并得到官方的祭祀，《圣祖圣谕》也有专人负责向百姓宣讲。

——摘编自 **【美】费正清著 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9 章，第 259~261 页**

## 小结

作为中国古代专制王朝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王朝有相对尴尬的族群身份——无论是关外的女真，亦或入关后的满清，都不是正统的汉族。在入关后消灭了南明残余势力，稳固了统治后，清代统治者注重了文化上的正统认同，采取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如特科取仕、修撰儒经、颁布圣训等手段，达到文化怀柔 and 道德训诫的目的。借此，满清统治者成功地承续华夏传统，将专制帝王的“治统”与儒家传统的“道统”相融合，确定了大清帝国统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即明清鼎革，应天顺民。

## 史料分析

从本题题意可知，康熙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实现政权的合法化和正统化，实施了一些怀柔措施来拉拢汉族官僚，从而为了达到承袭传统，巩固统治的最终目的，A项说法正确。B、C、D三项的是这些措施的客观影响，并不是主要目的。

## 素养考查

本题以康熙年间巩固统一的文化措施为情境，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等核心素养，调动学生康熙时期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措施、程朱理学的发展等知识，结合题目所设情境主旨进行进准研判，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28. 1846年，上海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20.1%。此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这可用于说明，进口货值的下降

- A. 阻止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 B. 导致西方商品倾销重心转移
- C. 促使传统手工业的恢复
- D. 成为列强进一步侵华的借口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鸦片战争后上海进口货值的增减情况为史实情境，突出说明进口货值始终无法恢复到1845年代水平。从设问的表述为“这可用于说明，进口货值的下降”，是通过分析数据信息变化归纳背后的最合理的历史解释。

### 史料来源 1

英国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国，鸦片战争后，各类英国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英货对华出口总量急剧增长，其中90%以上是棉织品和毛织品。但是英国商品并没有预期的市场，在1845-1855年的十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而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柯克：《中国》第166页）。在贸易中心上海，“1846年的（中国）进口货值即较前一年下降了13%，1847年又继续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3页）五口通商前，生丝和茶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后，中国出口品种逐渐增多，如皮革、猪鬃、锡、豆类、籽仁、食油、原棉、草帽辫及其他小手工艺品等，但茶叶和生丝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占中国出口总值的75%以上。自1846至1856年的十年中，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几乎连年递增，茶叶从1846年的46,746千磅递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生丝从20,270包递增到58,551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58页）英国从中国进口的丝茶迅速增加，而对华出口却进展缓慢，这就

势必造成英国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从 1850 年到 1856 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额逐步扩大，短短的几年中，逆差额从 4, 274, 880 磅涨到 8, 436, 072 磅，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蓝皮书：《提交上院的统计》1857 年，第 2 页）。英国在此期间曾扩大对华鸦片走私，其中 1845-1849 年中国年平均进口 3.9 万箱，1850-1854 年年平均进口 5.35 万箱，1855-1859 年年平均进口 6.85 万箱（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1842-1856, 1957 年版，第 46 页），但鸦片的盈利并不足以弥补其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仅生丝一项出口就可将其抵消。而作为第二大贸易国的美国情况与英国相类似，“对华贸易也有四百万至九百万美元的贸易逆差”（潘序伦：《中美贸易》，第 22 页）。巨额的贸易顺差让西方列强十分不解，拥有如此强大人口的国家为什么消费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严中平：《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 年，第 1-2 期）呢？

## 史料来源 2

鸦片战争后到 19 世纪 60 年代，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都猛烈增加。英货输入总值，1842 年为 426 万元，1843 年为 640 万元，1845 年达到 1053 万元。由于运到中国的棉毛织品销路不广，钢琴、刀叉等商品没人需要，从 1846 年 1855 年的 10 年间，除了 1851、1852 年两年以外，始终没有达到 1845 年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出现了与英国同样的情形，1845 年为 227 万美元，1855 年为 172 万美元。与英美对华商品输出停滞不前甚至减少的情况相反，中国的丝茶在国外的销路扩大，对英美的商品输出额大幅度增加。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总值，1850 年为 2574 万元，1856 年达 4687 万元。（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511，654 页）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第 91 页

## 拓展材料

从 1842 年至 60 年代后期的 20 多年间，进口棉货的数量虽较过去增加一些，但由于中国这种“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与时间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48 页。），因而作为中国自然经济的核心“耕织结合”，并未遭到破坏，只在沿海少数地区遭到极其轻微的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掠取了更多的推销商品的特权。资本主义各国本身因改进机器设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布匹的生产费用比 50 年代降低 84.5%。1869 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缩短中英海程的 28%，降低了运输费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第 55, 72 页。）这一切，使外国机制布匹在中国市场更加便宜，中国农村坚韧的耕织结合再也抵御不住这种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向外推销商品摆脱危机更属急务。70 年代以后，外国商品，特别是棉制品狂潮滚滚地从各个商埠涌进中国。英国棉制品破坏中国耕织结合的手纺织品，主要是用机纱打垮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使“纺”与“织”分离。同时也输出大量机制棉布（洋布）打击中国的手织棉布（土布），使“织”与“耕”逐渐分离。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842—1991》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第 122—124 页。

## 小结

鸦片战争结束后，通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如愿以偿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的棉纺织品等商品也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数年时间中，

英国商品在中国进口的货值不仅没有如预期那样大幅度提高，反而在 1846 年后出现了减少，其后虽然有回升，但极不稳定，到 1854 年都无法回到 1845 年的水平。究其原因，还是中国存在已久的“耕织结合”自然经济对大工业生产产品的顽强抵制。由于没有达到预期的商品倾销的效果，这一现象也成为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攫取更多侵略权益的主要原因。随着工业革命推进，机器设备得到改进，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生产费用大为降低；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降低了运输费用。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外国机制布匹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中国农村坚韧的耕织结合再也抵御不住这种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向外推销商品摆脱危机更属急务。70 年代以后，外国商品，特别是棉制品狂潮滚滚地从各个商埠涌进中国。英国棉制品破坏中国耕织结合的手纺织品，主要是用机纱打垮中国的手工棉纺业，使“纺”与“织”分离。同时也输出大量机制棉布（洋布）打击中国的手织棉布（土布），使“织”与“耕”逐渐分离。

### 史料解析

从题干的关键信息可以读出，情境的时空设定为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上海，主要数据为上海进口货值从 1846 年到 1854 年的变化趋势，整体是由降低到微弱回升，但极其不稳定，无法突破 1845 年的水平。A 项表述为阻止了自然经济的解体，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外来资本主义工业入侵的必然趋势，但就本题的时间段而言，尚处于外来商品倾销的早期，本国的自然经济客观的抵制作用，导致了进口货值的不稳定发展，并不能理解为阻止了自然经济的解体。B 项表述为导致西方商品倾销重心转移，事实是西方国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运输费用等手段，降低了进口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逐渐实现了其倾销商品的目的，并不是促使西方商品倾销重心转移。C 项指向促使传统手工业的恢复，这一阶段传统“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尚未完全发生破裂和解体，谈不上促使传统手

工业的恢复这样的逻辑表述。故而本题选择 D 项，成为英国等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动因之一。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中国近代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涉及《南京条约》、英国商品倾销、传统“耕织结合”生产方式的解构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中的数据变化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29. “百日维新前”，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这反映出，当时
- A. 革命已成为主要思潮  
B. 维新派变法策略未能统一  
C. 变法思想的根本转变  
D. 维新派侧重动员民众变法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在湖南倡导变法，引起新旧势力激烈论争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这反映出，当时”，是通过分析题干信息归纳最合理的历史解释。

### 史料来源 1

在梁启超的思想发展中，康有为是不可超越的人物。康有为思想的核心是大同、改良。早在 1888 年康就以一普通知识分子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书中从国际背景、中国前途、社会矛盾、官吏民情等方面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但是统治阶级并不为之所动。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深感民智未

开，人才匮乏，于是决定从教育入手，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即此，梁启超师从学习，完整的接受康有为的改良思想。跟随康及其思想，梁启超还做了很多的改革实验。其中最主要的是 1895 年的公车上书运动以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在这两次运动当中，梁启超不但是亲历者，而且是实际的执行者。这两次运动的意义是深远的，不但触动了封建统治的核心，而且使西方资本主义的部分民主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间广泛传播。但是它毕竟失败了，失败触动了梁启超的神经，给了他深思和怀疑的土壤。

其实梁启超在接受“改良”思想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跟随，而是不断的自求突破，推陈出新。早在“万木草堂”时他就是一位充满历史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对破败的中国政治针砭时弊，义愤填膺。他对古文经学大胆否定以动摇其神圣地位，在协助康有为编《孔子改制考》时溶入了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在接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又吸收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佛学的众生平等等思想，可谓是思想之集大成者。

对于腐败的政治，光是改良，已经无法平梁启超心中之气。1896 年，梁与汪康年、黄尊宪、邹凌翰、吴德潇等共同创办《时务报》。借助这块宣传阵地，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光是梁启超一人就撰文 260 篇，其中相当部分把矛头直指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思想之激越已不是其老师康有为所能及。梁也由此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思想的启蒙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嗣同与尊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在时务学堂与同事议论国事时，梁启超公然将反清革命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法。以《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出发点，提出开民智，兴民权，否定君权的神圣等。从思

想层面上，这已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相趋同。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超乎寻常的猛烈抨击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提出在中国要实现复兴，就要实行如西方的政治模式。为了说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梁专门写了《古议院考》，从各种零星的史料里论证我国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虽无议院之名，实有议院之体。这里就他用曲解历史的方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暂不讨论。单就思想而言，梁启超已由“改良”彻底转变为“革命”者。

——摘自曾小忙，江西鹰潭职业技术学院：《由〈释革〉谈梁启超之“变”》，文学教育(下)，2010,(11)，第16—17页

## 史料来源 2

在京城以外，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896—1898）间，各种名目的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建立，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书局的潮流。见于记载的比较大的学会在三十个以上，报刊在五十种以上，学校也在五十所以上。学会的性质是多样的，有纯属政治性的学会，有兼学西方政治和技术的，有专学西方技术的，有讲求幼童教育的，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的（如不缠足会、戒烟会）等。虽有这些区别，总的宗旨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改革旧社会、旧政治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湖南建立的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领导的南学会（该会应为1898年创办——编者），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组织。当时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是接近张之洞的洋务派官僚，在省内推行有限度的新政。长沙赞成维新的人集聚在南学会中，讨论时局，提出建议，发行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夏晓虹. 追忆梁启超[Q].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3] 朱维铮.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湘报》，鼓吹革新，在同地方保守势力的对峙中，占有优势。梁启超甚至把南学会说成是“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

保国会活动的时间很短。在它成立一个月后就有御史上奏弹劾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包藏祸心，乘机煽惑。”在封建守旧派看来，康有为的这种组织活动大有造反的嫌疑，军机大臣刚毅还准备查究。

——摘编自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编，第 233—234 页

### 史料来源 3

曾廉条陈另有一附片，摘录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在生徒日记上批语 4 条，其中一条为：“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这一条陈内容极具攻击性，相当于重磅炸弹。查当日军机处随手档，可以看到曾廉条陈的记录；再查次日军机处各种档册，均看不到曾廉条陈的记录；由此至 9 月 21 日政变发生，曾廉条陈似乎凭空消失了。光绪帝没有任何处理意见，也未上报慈禧太后。此为对康有为的第五次保全。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近代史研究》

### 引证材料 1

其一，陈宝箴戊戌五月二十七日的上奏，是要厘正康有为乖违之学术，其目的是表明他在湖南虽然推行新政，但与康并非同党，陈氏想借此化解他与湖南守旧势力的分歧，以图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陈氏厘正学术，维持风教的用意至为明显地表现在其奏章的结尾部分，谓：

可否特降谕旨，飭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正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且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至朱朱然胶守成说，误于歧趋。于皇上变通学校，转移人才之至意，亦可以风示朝野矣。如康有为面从心违，以欺蒙为搪塞，则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之流，将焉用之？窃揣康有为必不至此，臣为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才、维持风教起见，谨专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注：《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册，第359页。）

——《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05期

## 引证材料 2

湖南巡抚陈宝箴、其子陈三立对于康、梁的学术思想，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类并不认同，陈寅恪称：“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然对湖南新兴起的维新思想，陈宝箴、陈三立仍精心加以维护，以能用此促变湖南士绅的保守风气。作为一位地方官，陈宝箴在新旧两派对立中采取了折中主义的作法，尽力予以调和。尽管此时张之洞及其幕中对署理湖南按察使、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已有很大的负面意见，陈宝箴对黄仍是信任有加。然由学术对立而造成的政治对立，也使陈宝箴感到忧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2日），陈宝箴上奏“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

——茅海建：《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交谊及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 综述材料

即使温和的改革派和那些同情改制的人都难以接受康的解说。使康得到皇帝关注的翁同龢在读过《新学伪经考》之后，评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吾惊诧不已”。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评论说，康的《孔子改制考》超出了对儒家的寻常的学术解释，含有危险和令人生厌的政治暗示。孙家鼐是变法的同情者和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也批评这部著作，如他对皇帝说的那样：

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讖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已。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之于乱也。

康有为的“两考”在当时虽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朱一新、洪良品、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两考”也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注：江中孝《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

因此，康才智的发挥为他赢得今文学派支持者的巨大声誉的同时，也疏远了一大批温和而谨慎的学者。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 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第十五章，第 279—281 页

## 小结

康有为、梁启超自“公车上书”名声大噪之后，便在全国各地兴办学堂、报刊，传播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巡抚陈宝箴虽然倾向于改制，但对康梁民权说等主张并不认同，湖南守旧势力更对群起攻击。陈宝箴一方面为了调和新旧势力的矛盾，采取了折中主义做法；另一方面为了撇清与康梁的关系，主动向朝廷

呈递要求康有为将自己著作毁版的奏折。可见，在维新改制的问题上，各阶层人群虽然在方向上有共同的追求，但是在方法、策略上却可能是大相径庭。究其本质还在于不同阶层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政见难以趋同。

### 史料解析

从题干的关键信息可以读出，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利用这一契机刊印明末清初的《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传播反对君主专制的改制思想，其倾向与后来的革命派趋同。康梁的民权学说遭到了湖南省守旧势力的反对，包括赞同支持改制的巡抚陈宝箴也持反对态度。一时间新旧势力之间展开论争。A项指向革命已成为主要思潮，彼时占社会影响较主流的改制维新思潮，革命思潮尚未成为主流。C项表述为变法思想的根本转变，康梁的主张中梁启超的思想较于康有为更为激进，但未提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D项强调维新派侧重动员民众变法，通过题干信息可以推出维新派的思想传播在湖南省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不能据此说明维新派侧重动员民众变法，毕竟信众追随者只占民众的小部分。故本题选择B项，说明在维新变法的策略上，不同阶层人群的政见主张难以趋同，未能达成一致。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戊戌变法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中国近代甲午战后的时代特征，涉及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思想传播、新旧势力因此的论争分歧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0. 1939年，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1940年，毛泽东再次强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这说明，边区政府
- A. 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特征                      B. 脱离了国民政府管辖  
C. 代表根据地社会全体意志                      D. 仿行苏联的政治制度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甘宁边区采取“三三制”政权建设为史实情境。从设问的表述为“这说明，边区政府”，是通过分析题干信息归纳最合理的历史解释。

### 试题情境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边区建设的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梁星亮：《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当代陕西》，2019年第18期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

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 史料来源 1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楷模。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并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指出：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提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同时强调：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同月 11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在“三三制”政权中，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0 页。）

1941 年 1 月，中共边区中央局指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5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纲领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施政纲领为“三三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

按照“三三制”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 年 7 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 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 46 名，占三分之一多。11 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



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 12 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 6 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 39 名候选人中选出 18 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 7

名，略超过三分之一。此时，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林伯渠当选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副主席。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讲：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此后，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摘编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华文出版社

2017年7月版，第97—100页

## 史料来源 2

在政权机构中，中共中央要去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也就是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各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参议会。它的目的都是健全各根据地的民主制度，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共同对敌。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351页

## 引证材料

1937—1941年，所有16岁及以上的农民，都通过不记名投票的平等直接普选机制，加入了政治活动的潮流。毛泽东认为“所有人都能超越阶级、经验和思想的界限，创造性地参加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他还阐述了“三三制”，该项制度将参加边区政府和参议会

的中共党员限制到三分之一，将其余三分之二的席位让给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统一战线政策赋予边区一种民主的色彩。

——摘编自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 1600—2000 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二十四章，第 453 页

### 史料来源 3

####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

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建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次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了，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是领导的力量。下面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 史料来源 4

西安事变后，在取得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这一共识基础上，国共两党就共党合法问题、边区问题、军队问题、双方合作方式、指挥权问题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中共为表明自己的合作诚意，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明白的做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它对国共双方达成最终和解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国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

1937年2月24日，针对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周恩来提出的谈判方针：

-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 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至六七万人，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 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视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辱骂及反对共产党。

(五) 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周恩来年谱》1989年版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方面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 中共将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 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摘编自《解放》（周刊）第18期，

1937年10月2日

## 小结

全民族抗战期间，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措施。政治上的“三三制”原则就是一项推动革命阶级团结的根据地民主制度。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在“三三制”政权中，应该是：共产

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此后，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 史料解析

本题题干的信息清晰指向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采取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该政策是对团结各社会阶层、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A项表述为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特征，这种“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是全民族抗争的时期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表现，符合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为本题正确答案。B项表述为脱离了国民政府管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红色苏区的政权和工农红军的番号，名义上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不能理解为脱离了国民政府管辖。C项指向代表根据地社会全体意志，此说法过于绝对，边区政府应该代表了抗日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群，但不能笼统涵盖所有社会全体人群的意志。D项表述为仿行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仿行过苏联的某些政治制度，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策略属于符合国情的创新。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构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等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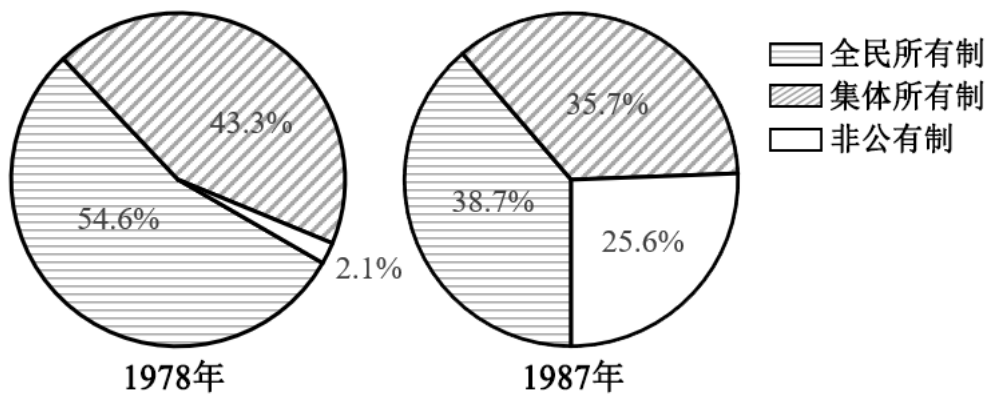


图 3

图 3 为 1978 年和 1987 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经济成分所占比重图。图示占比变化反映出

- A.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 B. 民众就业观念的转变
- C. 计划管理调控作用的增强
- D. 经济结构调整的完成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题干以 1978 年到 1987 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经济成分占比变化饼状结构图为数据情境，涉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占比变化。从设问的表述为“图示占比变化反映出”，是通过分析图示变化现象折射其反馈的本质问题。

### 史料来源 1

从 1979 年起，开始改革对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统购包销的流通方式。在工业生产资料方面，对原有 256 项统配物资，除 30~40 种最重要的燃料、原料、机电产品外，其他部分实行敞开供应和凭票供应。在基本建设所需物资供应方面，试行承包配套供应。在物

质经营方面，组织生产资料商场和各种综合性交易商场，将原有物资统一调配经营方式逐步改为商业性经营方式。对工厂生产的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等多种购销形式。扩大工业企业自销产品的权力。1982年，把工业消费产品的流通，由按城乡分工改为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归口经营、城乡统管的新体制，统筹安排城乡市场。

在改革流通形式的同时，进行多种商业渠道和商业经营形式的改革。在发挥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集体、个体商业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商业的零售总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7.2%提高到1982年16.1%、同期个体商业的比重则由0.1%提高到2.9%。

经济体制中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的单一，严重违背多层次生产力水平的要求。1979年以后，除原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之外，个体经济、联合体经济、股份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经济形式发展迅速。从1978年到1984年底，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由2048万增长到3216万，个体劳动者由15万增长到339万，分别增长了57%和22倍。在经营方式方面，由单一的统一经营模式，到承包经营、合资经营、联合经营、家庭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

——摘编自赵德馨 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309页，325—326页

## 史料来源 2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改变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活跃了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国家给予必要的保护。在国家的鼓励、支持和保护下，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很快，并在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

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87年同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个体工商等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

——摘编自何沁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第431~436页。

### 史料来源 3

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没有自由流动的自由；城市青年中，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的政策，其特点是“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执行的是“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大政方针。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

1984年，名为“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的调查显示，75.6%的青年希望在职业劳动中“把人民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干结合起来”。在社会制度的惯性作用下，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城镇青年，在面对就业时对自己的去向根本不能作出主观能动性的抉择。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由于指令性计划思想的箝制，也根本看不到青少年职业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这一阶段青年职业指导教育几乎是空白的，而是以宣传奉献精神、集体主义、又红又专的螺丝钉精神为主。

根据前述1984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调查结果，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第一位因素是社会地位，第二位因素是社会意义，第三位因素才是发挥个人才能和报

酬。应该说，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之所以排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主要是因为“国家先于个人、集体先于个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等宏观社会宣传的影响。

这一阶段中青年就业时最看重的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从今天仍然流行的知青“诉苦”文本来看，“上山下乡”务农是难以抹去的“伤痕”，所以务农在青年当中是倍受轻视的；高考恢复之后的数年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知青“回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一大景观，摆脱农业可以说是所有青年的梦想。在城镇中，就青年精英阶层的大学生而言，经商仍然是“末节”，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已经酝酿了人才的需求与流动，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开始允许农民在自筹资金、自理口粮的条件下，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建国初期开始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民工潮”，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

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改革。1989年，原国家教委在“中期改革方案”中指出，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使毕业生的就业逐渐走向市场化，这是毕业生就业制度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期改革方案”也就是知识青年“供需见面、双向选择”阶段。由此，青年就业的最大变化是“经济地位”成为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超过了执牛耳多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据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88 年对北京、哈尔滨、上海、南京、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十大城市 1300 多名大学生，内容涉及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等 14 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希望毕业后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工作的占近 40%；从部门角度说，大学生特别倾向到沿海开放地区的“三资”企业去工作，中外合资企业被置于择业考虑的第一位，相反，传统的优越单位如党政机关、科研部门、文化系统等的吸引力大幅度地削弱。

1980 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中开始有了“跳槽”现象，青年的职业流动也已浮出水面。甚至有的调查中，青年希望改变职业的比例高达 67.5%，许多青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步到位”到“骑马找马”的越来越多，人才的流动逐渐活跃起来。择业“三级跳”也层出不穷，即从“国营”跳到“集体”，从“集体”跳到“合资”，从“合资”跳到“独资”的现象，这使 1990 年代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工人急剧萎缩，“集体企业”职工纷纷外流，“三资”企业“人丁兴旺”。尤其到了 1993、1994 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热闹景象。

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1990 年代初期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标准是收入和福利待遇，占 36.6%；第二标准是自我价值实现，占 27.9%；第三标准是社会地位，占 23.4%。1990 年代初期青年择业的喜欢行业：金融保险业 26.8%，工业企业 20.8%，国家机关 12.1%，商、饮、服务业 12.1%，科研机构 10.6%，文化教育 7.9%，其他 9.7%。

——刘成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改革开放 30 年与青年就业观念的变迁》，中国青年研究. 2008,(01)，第 4—7，16 页

## 小结

由于建国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人群尤其是青年的择业观念依然囿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农村中青年没有流动的自由，城市中青年人，如高等教育毕业后依然是统包统分。社会人群的择业观念整体重政工轻农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渐转轨，农村青年开始向城市流动，高等教育下的大学生就业观也倾向于自主化、市场化，更多考虑经济收入，逐渐向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流动。因此在1978年到1987年的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经济成分所占比重图示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虽然占比依然占优势，但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如个体、合资、外资等有较大增加。这一变化正折射出时代大潮下，人群择业观念的重大变化。

### 史料解析

本题题干的信息以1978年到198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经济成分所占比重图示变化为情境依托，折射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中人们择业观念的重大变革，因此本题选择B项。A项指向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8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谈不上改革目标实现。C项表述为计划管理调控作用的增强，这一时期是放开社会人群流动的限制，表述与材料主旨并不相符。D项表述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完成，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达不到完成这样的表述。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构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综合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2. 梭伦为了鼓动雅典人重开争夺萨拉米斯岛之战，在广场上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促使雅典人废除了禁止公民提议争夺萨拉米斯岛的法律。某主战派统帅在战前说服雅典人把金钱用于建造海军，在战时又说服雅典人留在萨拉米斯。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 领袖人物具有绝对权威  
B. 平民与贵族的关系融洽  
C. 智者学派雄辩术的普及  
D. 公民直接参与城邦事务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梭伦、某主战派统帅（精英人物）要去说服大众、要征求大众的意见、要雅典民众就某一问题表态，来构建历史情境，以考察雅典民主政治。从设问的表述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是透过题干材料情境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旨在考查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 史料来源 1

所谓城邦国家即以个城市为中心把周围的若干村镇附属于城市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些城邦地方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大的也不过数十万人，具有小国寡民的特色。当时各地先后建立过二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有小亚细亚西部沿岸的米利都和以弗所；中希腊的特尔斐与雅典；南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和斯巴达。

各城邦原则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也经常通过结盟的方式保持政体治、军事方面的联系。古希腊虽不统一，但在语言文字、宗教节日活动、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基本一致，且都自称是“希腊人”。各城邦建立之初，氏族贵族多独揽政权。在政体上，有贵族共和、贵族寡头和君主制等不同形式。有的城邦因贵族斗争而形成僭主政治。希腊城邦并不完全是民主制。希腊公民的职责是随时准备打仗和进行思考，而不应为生存去劳动，这种贵族观念对于希腊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曹顺仙：《世界文明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第二章，第 34 页

这些城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上的独立，形式上的标志就是神庙的建立。这个时候许多城邦相继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这些神庙不但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同时也是城邦的政治、社会和军事活动的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地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

多数城邦都是弹丸小邦，最大的城邦斯巴达其面积也仅 8400 平方公里，人口总计约 40 万。城邦多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这些城市多设在地，位于交通和商贸要道上。每个城邦都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章，第 218—220 页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有‘执于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同时有权参加城邦内议事或审判的职能。”

——摘编自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注：城邦的主要特点：城邦是独立自主，小国寡民；设在地，位于交通和商贸要道上；与周边农村形成共生关系。公民在城邦中的重要地位；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国家的管理，并且有服兵役保卫城邦的军事义务。

## 史料来源 2

雅典走的是更为平等、更为复杂的改革的道路，她做了许多变革制度的尝试，特别是在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帝国时期。在雅典，自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富有的贵族与多数贫穷的公民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首先是提秀斯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①设中央管理机关，把各部落的重大事务收归中央议事会管理；②把雅典的所有公民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掌管行政、司法和宗教权力。这反映了雅典的这个“王”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维护的是贵族特权。

公元前 8—前 7 世纪，雅典设立执政官—贵族会议—公民会议等机构。执政官由一人后增至九人，分掌内政、宗教、司法和军事。由公民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一年一任，期满后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决定国家一切大事，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成员都为贵族，实行终身制。公民会议则由自备武装的军人组成，这些军人有权参加国家官吏的选举，但出身平民者无权出任。

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产生发展期（公元前 6—前 5 世纪中叶）；繁荣期（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前 5 世纪末）；民主制衰落期（公元前 5 世纪末—前 4 世纪下半期）。其间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延续了近二百年。如影响较大的有公元前 594 年的梭伦改革，公元前 509 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公元前 443 至前 429 年伯里利克改革……。

课时小结：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比较			
改革	时间	主要内容	影响
梭伦改革	前 594 年起	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按财产多少划分社会等级；设立公民大会、四百人会议、陪审法庭。	一定程度上改变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
克利斯提尼改革	前 506 年起	以地域为基础划定行政选区；设立向所有公民开放的“五百人会议”；选举十将军委员会；制定“陶片放逐法”。	打破部落贵族对政权的控制，使所有公民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标志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及民主政治确立。
伯里克利改革	前 443 年—429 年	各级官职向所有公民开放、以抽签方式产生；确立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家为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津贴。	大大削弱贵族的政治权力，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25—226 页；

曹顺仙：《世界文明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第二章，第 35—37 页

### 引证材料 1：梭伦改革的内容

公元前 594 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

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

这是一个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雅典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新的政权机构，贵族会议大受限制。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 4 部落各选 100 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

第四项改革措施则包括那些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

——摘编自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第 247—249 页。

## 引证材料 2

古代雅典首创的直接民主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城邦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这一制度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在国家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誓死抵抗；在和平年代，为城邦的富强和昌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每个公民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使得公民的政治素质普遍提高，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兼具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素养。同时，民主政治也为雅典文化创造和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在民主制的稳固时期，雅典的国力强大，文人荟萃，思想活跃，成为整个希腊最

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希腊的学校”。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为近代西方的代议

民主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人类文明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章，第 157—158 页

### 引证材料 3

首先，实行民主的基础和范围是十分狭小的。城邦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民主权利之外。第二，雅典虽然对内实行民主，但对外毫无民主可言，雅典对提洛同盟各邦在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压榨、外交上的干预就是最好的例证，雅典正是利用这些对外专制得来的本钱装点着本邦的民主。第三，尽管在法理上所有公民都有直接参政的权利，但在实际运作中，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以及各类公职还是掌握在富有的中上层奴隶主阶级手中，握有重拳的十将军始终通过选举产生，没有薪俸，几乎排除了贫穷公民当选的可能性。所以，在民主管理的实际参与度上还是要打一些折扣。最后，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不同，雅典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民主政体，只能小范围内实施。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章，第 158 页

### 史料来源 3

希腊和波斯战争（公元前 500—前 449 年）结束以后，整个希腊半岛的经济和文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历史时期。当时，希腊城邦尤其是在雅典，由于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经济的空前繁荣，使统治阶级上层日益感到提高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雅典公民为了能够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和参加城邦事务的管理，也更加迫切要求受到多方面和更高的文化教育，使之能够在法庭、人民大会和一切公共场合阐发自己的主张，以动人的演说驳倒对方争取群众这样，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辩论术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人们需要掌握演说的方法和

**技巧。**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传播新颖的知识，教授辩论术的技巧，于是便在希腊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师，他们就是所谓的智者。雅典的对外开放和宽松的环境气氛，更为智者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智者从希腊各地来到雅典，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教育为职业，接受报酬代行学校的任务，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程禹文著：《世界全史·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二章，第24—25页

### 小结

公元前8—前6世纪，古代希腊地区的城邦逐渐发展起来。它们数量众多，其典型特征是小国寡民，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斯巴达和雅典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个城邦。斯巴达是少数人掌握政权的寡头政治的代表，雅典是多数公民掌权的直接民主政治的典型。

在雅典，公民都有出席公民大会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直接决定城邦的大政方针。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

雅典民主政治促进了雅典经济和学术的发展，其理论和实践为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是，雅典民主政治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仅是本邦“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被排除在外；是一种原始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抽签选举和轮流坐庄的形式，容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误用，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往往演变为“多数暴政”，个人自用平等得不到保障甚至收到严格限制；雅典城邦内部及希腊城邦的混乱，使城邦制度逐渐衰，公元前338年，希腊诸国被马其顿国吞并，雅典民主淹没在历史中。

###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梭伦、某主战派统帅（精英人物）要去说服大众、要征求大众的意见、要雅典民众就某一问题表态。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古代雅典，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城邦政治。

**A** 项领袖人物具有绝对权威。题干主旨在于强调梭伦、某主战派统帅（精英人物）要去说服大众、要征求大众的意见、要雅典民众就某一问题表态；结合所学，雅典实行的奴隶制民主政治。故 **A** 项不符合题干主旨与史实。

**B** 项平民与贵族的关系融洽。题干情境是梭伦为了鼓动雅典人重开争夺萨拉米斯岛之战、某主战派统帅为了让雅典人把金钱用于建造海军、让雅典人留在萨拉米斯采取的手段都是“说服”，未涉及到平民与贵族的关系问题。

**C** 项智者学派雄辩术的普及。依据史实，智者学派雄辩术的发展与雅典民主政治需要举行演讲、游说之间有一定关联。但是依据题干情境，仅仅看到梭伦、某主战派统帅（精英人物）去说服大众，一两个精英不能代表全部、更不能推出“普及”，故 **C** 项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并且不符合题干主旨。

**D** 项公民直接参与城邦事务。依据史实，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态是直接民主；依据题干，梭伦、某主战派统帅（精英人物）要去说服大众、要征求大众的意见、要雅典民众就某一问题表态，这本身就是公民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的表现。故 **D** 项符合题干主旨、史实逻辑。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的相关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表 1

进口货物	占总货物的价值比（%）	
	1664—1670 年	1731—1740 年
胡椒	20.1	4.3
茶叶	0.02	9.26
咖啡	0.63	5.35
棉纺织品	62.59	65.35

表 1 是学者统计的 17—18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部分亚洲货物价值占比。据表可知，该时期

- A. 生产方式决定进口货物价值占比      B. 英国确立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  
C. 殖民扩张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变化      D. 工业革命促进东西方贸易增长

### 高考原题

（2015·新课标全国 II 卷文综·32）17 世纪 60 年代，茶叶在英国只是上流社会的消费品；到 18 世纪末，茶叶已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品。这反映了当时的英国

- A. 等级观念明显淡化                      B. 崇尚东方的生活方式  
C. 贫富差距日益缩小                      D. 扩大了与东方的贸易

答案选择 D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学者统计的 17—18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部分亚洲货物价值占比来构建历史情境，以考察早期殖民扩张的影响。从设问的表述为“据表可知，该时期”，是通过分析数据信息变化归纳背后的最合理的历史解释。

### 史料来源 1

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与殖民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各国君主、商人和险家的贪欲，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冒险家纷纷出动，加入了殖民强盗的行列。英国在 1495 年，法国在 1524 年开始了早期的探险活动。1588 年“无敌舰队”的覆灭，使西班牙海上力量遭到沉重打击，荷、英、法的殖民势力迅速崛起。

17 世纪初，海上的世界霸权逐渐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转到荷兰手中；就在 17 世纪荷兰执世界殖民贸易的牛耳的时候，英、法两国起来向荷兰争夺霸权了。荷兰在 17 世纪虽然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确立了它在世界上的商业霸权地位。但是，荷兰的工场手工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没有工业基础，完全是个商业国家。相反，后起的英国则是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工农业都有了相当发展，经济基础雄厚，迅速成为荷兰的劲敌。特别是通过 3 次英荷战争，荷兰的实力大力削弱了。

英国代替荷兰取得海上霸权后，在欧洲大陆能与英国抗衡的就属法国。这时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的军事封建国家，不但称雄欧洲大陆，而且在亚洲和美洲等地也陆续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这样，英、法两个大国为争夺殖民地与欧洲霸权，爆发了多次战争。

.....

通过七年战争，法国失去了它在欧洲大陆称霸的地位，海上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英国则登上“海上霸主”的地位，并为其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王助民、李良玉、陈恩虎等：《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02，第 24、42、48、49、67、70 页。

## 引证材料

表 2-25a 英国和世界船舶航运能力, 1470 ~ 1913

(千吨)

	帆船	轮船	运载力合计 (帆船当量)	帆船	轮船	运载力合计 (帆船当量)
	英国			世界		
1470	—	0	—	320	0	320
1570	51	0	51	730	0	730
1670	260	0	260	1 450	0	1 450
1780	1 000	0	1 000	3 950	0	3 950
1820	2 436	3	2 448	5 800	20	5 880
1850	3 397	168	4 069	11 400	800	14 600
1900	2 096	7 208	30 928	6 500	22 400	96 100
1913	843	11 273	45 935	4 200	41 700	171 000

资料来源: 英国 1470~1780 年数据来自表 2-15, 1820~1913 年数据来自 Mitchell 和 Deane (1962, pp. 217~219)。世界 1470~1780 年数据来自表 2-15, 由于欧洲船队的统计口径不全, 因此将世界 1470 年、1570 年和 1670 年数据向上调整。其中, 1470 年的调整系数为 1.85, 1570 年为 1.34, 1670 年为 1.07。对于 1470~1780 时期, 在世界总计中我还加上亚洲船只货运量的粗略估计 100 000 吨。1800~1913 年数据来自 Maddison (1989a, p. 145)。考虑到蒸汽船较快的速度和较稳定的正常运营能力, 将蒸汽船与帆船之间的等量系数定为 1 比 4, 即 1 艘蒸汽船相当于 4 艘帆船(参见 Day (1921, p. 290))。

表 2-25b 英国和世界船舶航运能力以及 GDP 的增长率, 1570 ~ 1913

(年均复合增长率)

	英国航运能力	英国 GDP	世界航运能力	世界 GDP
1570~1820	1.56	0.79	0.84	0.33
1820~1913	3.20	2.13	3.69	1.47

资料来源: 航运能力数据来自表 2-25a, GDP 数据来自附录 B 中的表 B-13 和 B-18。

——摘编自【英】安格斯·麦迪森著; 伍晓鹰等译: 《世界千年经济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1, 第二章西方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1000-1950, 第九节英国, 第 88 页。

## 史料来源 2

英国官商合营的东印度公司于 1600 年成立后, 击败了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军事优势, 在孟买、加尔各答等地站稳脚跟。1757 年, 普拉西战役的胜利, 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奠定基础。此后, 通过一系列战役, 确立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 1849 年, 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和掠夺印度的工具和殖民剥削的执行机构。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它一开始就采取以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直接搜刮和抢劫手段, 仅侵吞孟加拉国库一项, 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 3700 多万英镑的收入, 其中 2100 万英镑被高级官

吏们中饱私囊，而克莱武自己就拿走了 23 万多英镑。除直接掠夺之外，还用苛捐杂税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仅 1760—1780 年间，用这项收入向英国输进价值 1200 多万英镑的商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连一文本钱都没花。

鸦片贸易（占公司收入 1/7）和向当地商人出卖豁免国内关税的执照，也是公司一笔发大财的买卖。公司的所有官员都疯狂地搜刮财富。两次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的克莱武，一度曾企图节制部下的贪欲，为此提高官员工资并禁止他们经商和接受“礼品”。但所有措施都无法制止发财心切的人，连克莱武也在设法赚钱。他组织了盐和烟草垄断公司，参加的高官们共分经营收入，他自己一年就可赚 1.7 万英镑。东印度公司对土地税的掠夺也占有很大比重。在 1765—1766 年，征收孟加拉的地税为 147 万英镑，1771—1772 年增加到 234.1 万英镑，1775—1776 年增加到 281.8 万英镑。

英国在 18 世纪后半期对印度的侵略和榨取，给印度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大量财富（1757—1815 年共榨取 10 亿英镑）流入英国，转化为资本，促进了各种科技发明的增多和许多贵重设备的普遍采用，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侵略和掠夺印度的过程中，逐渐由官商公司向英印政府过渡。1773 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制度”，规定英国政府任命印度领地的总督，结束了孟加拉统治者管民事、公司掌田赋的“双重管理制度”。1784 年，英国国会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管理印度法案”，规定由内阁任命督察委员会处理印度一切重大事务，使英国政府获得了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1813 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开始了英国工业资本剥削印度的新阶段。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卷主编：《世界史 近代史编》下卷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02，第 200—202 页

## 引证材料

表 2-21b 英国从印度“攫取”的财富，1868~1930

	印度出口顺差占其 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印度出口顺差占英国 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1868~1872	1.0	1.3
1911~1915	1.3	1.2
1926~1930	0.9	0.9

资料来源：Maddison (1989b), pp. 647~648 对印度/英国之间的收入比率进行了修正。这种殖民地财富“流出”(根据殖民地的贸易顺差来衡量殖民负担)最初显著地见于 19 世纪 70 年代以 Naoroji 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文献中(Naoroji, 1901)。我采用同样的概念计算了印度尼西亚的负担,并分别以它占本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宗主国的收益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将印度尼西亚与印度进行了比较。请参看 Maddison 其他有关讨论(1971, pp. 63~66)。

——摘编自【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千年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第二章西方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1000—1950，第八节，荷兰，第 80 页。

## 史料来源 3

表 2-23 按输出地和输入地划分的英国进口和出口商品结构, 1710~1996

(占现价总值的%)

	欧洲	亚洲	非洲	北美洲	英国西印度	其他美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进口							
1710 <sup>a</sup>	63.6	6.9	0.4	7.3	21.7	0.1	0.0
1774	46.1	11.4	0.4	12.5	29.3	0.3	0.0
1820	26.8	24.6	0.5	14.6	26.0	7.5	0.0
1913	40.7 <sup>b</sup>	15.7	3.0	22.6	0.8 <sup>c</sup>	9.6	7.6
1950	27.8 <sup>b</sup>	17.2	11.0	15.9	5.1 <sup>c</sup>	8.6	14.4
1996	61.7	18.8	2.2	14.1	0.3 <sup>c</sup>	1.7	1.2
出口和转口							
1710 <sup>a</sup>	87.6	2.1	1.2	5.1	3.4	0.6	0.0
1774	58.5	3.9	6.0	21.5	10.0	0.1	0.0
1820	61.8	7.1	1.1	11.7	9.0	9.3	0.0
1913	37.4 <sup>b</sup>	22.7	6.4	13.5	1.0 <sup>c</sup>	8.7	10.3
1950	28.8 <sup>b</sup>	18.9	13.2	14.4	1.7 <sup>c</sup>	7.2	15.8
1996	63.3	16.8	3.0	13.3	0.3 <sup>c</sup>	1.5	1.8

a) 英格兰和威尔士; b) 包括北非; c) 包括所有加勒比岛国。

资料来源：1710~1820 年数据来自 Mitchell 和 Deane (1962), pp. 309~311, 1913 年数据来自 pp. 317~323。1950 年数据来自 Mitchell 和 Jones (1971), pp. 136~139。1996 年数据来自 *U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1996, p. 1065)。在 Mitchell 和 Deane 的另一著作中(1962, pp. 2679~2684)提到, 在 18 世纪 20 年代和 70 年代英国的转口占其国内出口的 58% (即占其总出口的 37%), 而在同一时期荷兰这一比例分别为 53% 和 220% (参看表 2-19)。在 1913 年, 英国再出口为国内出口的 20.8%, 在 1950 年降为 3.9%。在 1710 年, 羊毛纱和绒纱及其制品占国内出口的 78%, 1774 年为 49%, 1820 年为 12%, 1913 年为 6%。在 1774 年, 棉纱及其制品仅占国内出口的 2%, 1820 年上升到 62%, 1913 年为 24%, 1938 年为 11%。

从事这种商业贸易的另一个吸引力是它涉及的新产品所可能带来的利润。在 16 世纪，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糖几乎不为人所知。到 1700 年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均糖消费量达到 2.6 公斤，烟叶的人均消费量从零增加到大约 1 公斤，对茶叶和咖啡的消费需求也开始了。从印度进口的印花棉布给人们带来了新品味和新时尚，从中国进口的陶瓷制品也对国内器皿用具产生了相似的影响。这些新消费品的需求弹性非常大，而且占据了个人消费的很大比重。格列高里·金的估计表明，在 1688 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对食品、饮料和纺织品的支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58,5%（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时，该比例大约仅为 16%）。

商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贸易战的日标。从 1651 年开始，英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法案禁止国外船只涉足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强迫其殖民地通过英国港口出口本国商品。结果英国形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模式，那就是从殖民地的进口商品被大量用于再出口，这也是荷兰和法国贸易模式的特征（参看表 2-23 的注解）。这些法案最终在 1849 年都被废除了。

——摘编自【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千年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第二章西方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1000-1950，第九节英国，第 85-86 页

### 引证材料 1

回忆一下至少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日常奢侈品”膨胀的限制是很重要的。1400 年以后新出现的食品、纤维、饮料之类的情单令人眼花缭乱，很多东西能让人上瘾。但至少 18 世纪末之前，一般说来直到 19 世纪，它的传播都相当缓慢：巨大的增长幅度通常反映出最初的基数很小，即使在欧洲最富裕的区域也是如此。1800 年前后即使在英格兰，每人每年也只消费约 1 磅茶叶，1840 年为 1.4 磅，正是在那以后价格急剧下降，普通人成

为每天饮茶的消费者。(到 1880 年每人每年的消费达到 5 镑左右。)至于欧洲其余地方，数字要低得多。1750 年代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据说每年消费茶叶 2200 万磅，这意味着全大陆每人约消费 2 盎司，而除英国以外的欧洲消费量要小得多。甚至到 1840 年，欧洲输入的 8000 万到 9000 万磅茶叶，也只不过供给每个居民每年 4 盎司。

表 3.1 人均糖消费量(磅)

	欧洲	欧洲(英国除外)	英国
1680	1.0	0.85	4
1750	2.2	1.90	10
1800	2.6	1.98	18

——摘编自【美】彭慕兰著；史健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第 109—110 页。

## 引证材料 2

表 2-20 欧洲从亚洲进口商品的构成, 1513~1780

葡萄牙(印度国家贸易公司, 总部设在果阿)		
(占总重量的%)		
	1513~1519	1608~1610
胡椒	80.0	69.0
马鲁卡香料	9.0	0.03
其他香料	9.4	10.9
纺织品	0.2	7.8
靛青	0.0	7.7
其他	1.4	4.6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享有垄断经营权, 总部设在巴塔维亚)		
(占总价值的%)		
	1619~1621	1778~1801
胡椒	56.4	11.0
其他香料	17.6	24.4
纺织品和生丝	16.1	32.7
咖啡和茶叶	0.0	22.9
其他	9.9	9.0

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主要在孟买、卡尔库塔和马德拉斯从事垄断经营)		
(占总价值的%)		
	1668~1670	1758~1760
胡椒	25.3	4.4
纺织品	56.6	53.5
生丝	0.6	12.3
茶叶	0.03	25.3
其他	17.5	4.5

资料来源: Prakash (1998), pp. 36, 115, 120。

——摘编自【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千年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第二章西方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1000-1950，第八节荷兰，第 76 页。

#### 史料来源 4

18 世纪 20 年代，正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从那以后，茶取代丝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据档册记载：1717 年，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1722 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已占有 56% 的比例，与丝绸的进口值相比具有了较大优势，1761 年更达 92%，之后略有波动，但茶叶的进口量总是超过丝绸。……茶叶对荷兰的贸易转折也在

18 世纪 20 年代。1729 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值已占到 85.1%。此间活跃于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来中国的最主要动力，其他货物只不过是点缀而已”。**茶叶成为 18 世纪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货品。**

**18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中国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哈孟德夫妇指出，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在横过大西洋或是绕过好望角行驶的船舶上，所运的货物不是为宫廷或教堂而是为小巷和农户而预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只有当资本能被用来生产人民大众所消费的货物时，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制造才有可能。”**从为上等人提供华绸锦缎到为大众提供日常饮料，易代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航海技术的欠缺、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由贵族转向大众，丝茶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映出时代的巨变。**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14 年 7 月

### 引证材料

**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也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的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它帮助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赋予了后者长期主宰世界经济秩序的权力，但它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促成了其内部的改革。**棉花资本主义给美国带来了一个棉花王国，但它引爆了美国内战，并终结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奴隶制。棉花资本主义帮助殖民主义掠夺了全球南方的资源和劳动力，但它也激发了全球南方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并帮助开启了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

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棉花帝国的扩张过程，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都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中来，或者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受益者、参与者、鼓吹者，或者成了它的受害者、批评者、反对者，没有人可以逃离它的影响，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和国家都卷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将它们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代理人、协调者或管理者。资本主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它还处在变化之中，它的新的全球故事仍然需要历史学家的继续讲述。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著；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中文版序言13—14页。

## 小结

17-18世纪，荷兰、英、法等欧洲国家纷纷加入殖民地争夺行列，建立海外殖民地。欧洲的商人和殖民者直接同世界各地建立起商业联系，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其中，英国通过、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三次英荷战争、英法七年战争，奠定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它在世界各地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掠夺，对欧洲资本原始积累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国内流动的商品种类日益增多，各大洲的商品都在国内可见，商品种类的丰富也影响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

##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分析表中信息可知，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部分亚洲货物价值占比变化情况为：从1664-1670年到1731-1740年，胡椒进口比例大幅度下降，茶叶、咖啡、棉纺织品有所上升。进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势必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A项生产方式决定进口货物价值占比。依据题干所涉及时间段1664—1740年，工业革命尚未开始，生产方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再者从逻辑来看，进口货物价值受内需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不是生产方式所能决定的；无论从题干情境、史实逻辑而言，A项都不符合。

B项英国确立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结合所学可知，16-18世纪英国通过三次英荷战争、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法七年战争，最终在18世纪中期成为了日不落帝国；题干两栏时间的转折点在1664—1670年与1731—1740年之间；因此B项不符合题干主旨。

C项殖民扩张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664—1670年、1731—1740年正是英国争夺海上殖民霸权的重要时间段；并且结合表格信息，胡椒占比呈下降趋势，茶叶、咖啡、棉纺织品占比有所上升，进口商品种类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正是殖民扩张所造成。因此C项符合题干主旨、史实与逻辑。

D项工业革命促进东西方贸易增长。结合所学，可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题干时间段1664—1740年，工业革命尚未开始，因此D项不符合史实。

### 素养考查

本题以17—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部分亚洲货物价值占比来构建历史情境，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英国殖民霸权的确立、殖民扩张的影响等相关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4. 蒸汽机发明后，日益成为欧美国家雇佣大农场机器动力的重要来源，需要多人协同操作。20 世纪初，农业机械的使用变得个人化、小型化，家庭农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缩小了与雇佣大农场的差距，后者日趋衰落。这一系列变化表明
- A. 内燃机的应用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 B. 农业技术发展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
  - C. 蒸汽机成为农业生产的机器动力来源
  - D.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依赖于生产规模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欧美国家农场中所用的农业机械的操作多人协同到个人化、小型化；雇佣大农场衰落日趋，家庭农场日益崛起构建历史情境，以考察两次工业革命对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从设问的表述为“这一系列变化表明”，旨在考查学生通过现象看本质的历史解释能力。

### 史料来源 1

1789 年瓦特得到了万能蒸汽机的专利权。这种机器很快就在全国广泛应用。除用在纱厂之外，还应用到冶金厂、面粉厂，并在后来应用到运输业中，导致了运输工具的改造。

技术发明不仅仅停留在棉纺织业和蒸汽机改良上，也使钢铁行业受益匪浅，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钢铁促进了机械化的发展。1709 年后，英国冶炼行业开始用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钢铁促进了机械化的发展。1709 年，英国冶炼行业开始用焦炭（由煤提炼而来）替代相对昂贵的木炭作为冶铁的燃料，砍伐森林使得英国的木材紧缺，而木材是制作木炭的主要原料。焦炭除了价格更便宜，还使生产者能够建造更大的鼓风炉，增加铁的产量。结果，在 18 世纪，英国的产铁量突飞猛进，而价格却更加便宜了。价格低廉的铁制设备和零部件使得工业机器更为牢固强劲，并很快应用于建筑、造桥及造船业中。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本卷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12，第四章第一节英国工业革命

到19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地从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扩散到欧洲大陆，甚至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最初，工业革命的扩散面临各种障碍。首先，英国有一项法律，禁止机器出口。其次，欧洲大陆上的各种情况不利于工业化：如政治分裂、农奴制度、政治动荡、革命和战争等等都妨碍工业革命的进行。但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上述那项法律也在1825年被废除。而且，英国工业家到19世纪30年代已积累了大量过剩资本，在欧洲大陆寻找投资场所，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机器的出口。阻碍工业革命扩散的其他障碍也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因此，欧美诸国先后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本卷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12，第四章第二节工业革命的扩散

奥托内燃机采用的是煤气作为燃料，而煤气必须由煤气发生炉这样大的装置提供，这就产生了许多不便之处，例如，这种内燃机无法用在车、船这种远程移动性机械上。

无巧不成书，19世纪中叶以来，燃料工业正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1854年，美国工程师西里曼成功地发明了石油的分馏方法，汽油、煤油、柴油等优质燃油投入应用。1859年，美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从此开始了对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利用。1883年，德国发明家戴姆莱研制成功了第一台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由于汽油的燃烧值远远高于煤气，所产生的动力也远大于煤气内燃机。1892年，另一位德国工程师狄塞尔造出了一台用柴油作燃料的高压缩型自动点火内燃机，这种机器由于增加了压缩过程，使热效率进一步提高，达到27% - 32%。从此，柴油机这种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的新式动力机逐渐取代蒸汽机，成为工业上的主要动力机。

### 史料来源 2

正是由于一系列纺织机器的发明，使用旧式纺车和织机的手工业者遭到了排挤，他们破产之后，便成为雇佣工人。……产生了一批租用五十英亩、一百英亩、二百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的大佃农，他们建立起大农场……（那些小自耕农）或者流入城市出卖劳动力，或者成为农场主的雇工……随着冶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农业机械日益增多。

——摘编自许永璋：《世界近代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推动了农业的变革。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机器制造、化工、电力技术的进步，不断为农业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化学肥料、农药和电力，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的应用引起农业机械的革命性变革，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化学肥料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合成氨的突破和化肥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大量养分高、肥效快、便于运输和机械化施用的优质肥料。这一切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工业文明的兴盛》

两次工业革命对农业的影响：沟通了城市和乡村的联系，促进了道路运河建设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化学肥料生产技术的兴起，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更多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领域。

### 史料来源 3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各国农业中的雇佣农场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雇佣劳工在农业劳动力的构成比例中日益上升，雇佣经营的大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日趋上升。

这种情况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地区表现特别明显。在这一时期，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农业中的这种大型化趋势和雇佣劳工在农业劳动者构成比例中的上升趋势相对于工业部门要缓慢得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 19 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趋势却分道扬镳，朝着相反的趋势发展。在工业部门中，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工业企业日益大型化，生产日益集中，大企业主宰了工业生产，甚至出现了不少巨型企业，雇佣成千上万的工人。然而在农业生产部门，雇佣型大农场排挤家庭农场的趋势不仅止步不前，还出现了雇佣型大农场走向衰落的局面。它不仅表现为雇佣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比例中的下降，还表现为大型农场在农业经营中比例的下降。令人惊讶的是，伴随着 19 世纪末逐步推广的农业生产机械化，却并没有带来家庭式农业生产的衰落，相反却出现了家庭式生产复兴与雇佣农场制度的衰落。

总的来说，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特性，农业部门分工合作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不高，而监督成本却很高，使得农业部门的工厂式大规模经营相对于家庭式经营并没有多少优势，难以抵消家庭农场的“劳动自我剥削”所带来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型大农场的大规模兴起必然要有一些特殊的经济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19 世纪晚期以前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农场经营的发展，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工业革命初期，社会上存在大量的过剩廉价劳动力，农业劳工价格低廉，而且当时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粮食价格高昂，从而使得规模效益并不明显的雇佣经营有利可图。另外，当时各国尚未建立起有利于小农经营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小农经营在资金获得、技术引进与市场交易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家庭经营方式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随着雇佣型大农场兴盛的特定历史条件——粮食价格高涨和农业劳工价格低廉——在 19 世纪晚期的消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进入危机，走向衰落。而曾

经被经典作家几乎判定死刑的**家庭农业经营**，不仅没有被排挤，而且还比雇佣农场更有活力，无论是在农业经营者的数量比例上，还是在土地占有和市场份额上，**都处于上升的地位**，逐步排挤了雇佣农场的优势地位，占据了农业经营的主导地位，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在一个市场竞争加剧、工业进步和技术发展的新时代，家庭农场实现了现代化，家庭农业经营方式并没有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障碍。

——摘编自文礼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失败》，《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 小结

从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扩展到欧美大陆和北美；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到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有电力技术的广泛开发和应用、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等工业革命使生产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革，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

其中欧美国家农业的变化表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各国农业中的雇佣农场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雇佣劳工在农业劳动力的构成比例中日益上升，雇佣经营的大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日趋上升。伴随着 19 世纪末逐步推广的农业生产机械化，出现了雇佣型大农场走向衰落与家庭式生产农业复兴的局面。家庭农业经营逐渐占据了农业经营的主导地位，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19 世纪 60、70 年代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动力发生了变化，电力和内燃机取代了蒸汽动力，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结合材料，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农业生产，发生了两个变化：①劳作方式上：大农场机器需要多人协同操作→农业机器的使用变得个人化、小型化；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雇佣大农场（衰落）→家庭农场（崛起）。而“大农场机器需要多人协同操作”本身就是蒸汽机发明带来的局面，由需要多人协作→个人化、小型化这一变化，本身即说明有了比蒸汽机更为先进的机器。

A项内燃机的应用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结合所学，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内燃机的应用改变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A项符合题干材料与所学知识。

B项农业技术发展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材料并未体现出来；另外依据逻辑，农业技术发展也可以带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技术发展导致的农业机器的使用变得个人化、小型化这一现象，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是节省的劳动力可以转入工业领域。因此农业技术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无论从题干情境、史实逻辑而言，B项都不符合。

C项蒸汽机成为农业生产的机器动力来源。依据材料可知“大农场机器需要多人协同操作”本身就是蒸汽机发明带来的局面，在这时蒸汽机就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机器动力来源，故C项不符合材料主旨。

D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依赖于生产规模。D项“依赖于”的同一表述即为“决定”。生产规模是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决定因素，D项符合材料主旨与史实逻辑。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两次工业革命对农业的一系列影响，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两次工业革命的起止时间、主要表现、影响等相关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35. 1951年，美国黑人团体民权大会向联合国发起请愿活动，指控美国政府对黑人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美国政府指责请愿活动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寻找支持政府的黑人来驳斥这些指控。这反映出当时
- A. 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正式形成
  - B. 民权大会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
  - C. 美国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受冷战意识影响
  - D. 美国政府对国内的种族平等问题漠不关心

### 试题分析

从试题材料情境而言，本题以美国政府对于黑人民权运动有关种族问题的看法来构建历史情境，以考察冷战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二战后，随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北约的建立等，冷战的程度日益加剧，并日益影响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从设问的表述为“这反映出当时”，旨在考查学生通过现象看本质的历史解释能力。

### 史料来源 1

二战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开始经历重要的变化。外国也开始更加关注美国的种族问题。西方盟国想了解美国的社会，尤其是种族歧视问题。亚非国家的人民正在摆脱殖民统治，就像关心欧洲殖民主义一样，也十分关心美国对本国黑人的歧视问题。随着美苏敌对加剧，苏联常常谴责美国的种族歧视，并努力借此来赢得第三世界人民的联盟。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承认种族歧视给美国的外交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这些国际关注使很多美国自由派和政府官员担心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缺陷。黑人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则欢迎这种对种族歧视的国际关注。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好几个国际宣言的发布给美国黑人很大鼓舞。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为美国黑人领导人在国际观众面前表达他们的悲伤提供了便利的舞台。1946—1951年6年时间，三个美国民权和左翼组织——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利用了这个舞台。它们

先后分别向联合国提交了请愿书，抗议美国黑人遭受的歧视，并呼吁得到帮助，得到广泛的关注。

.....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20世纪40年代中期本来为黑人自由斗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时高工资、高就业率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工会，以及强有力的联邦干预，赋予了黑人工人阶级很强的自信，为一个自发的劳工起源的民权运动的发展确立了框架。然而冷战初期公共话语空间的缩小导致了民权运动的失败与分散。反共主义的增长粉碎了关于民权的人民阵线联盟（即劳工、左派和民权联盟），同时工会运动的后退和被遏制剥夺了黑人积极分子开展独立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和社会空间。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冷战，反共的赤色恐慌压倒一切，左派没有了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本来正蓬勃发展的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权运动戛然而止。向联合国请愿活动成为黑人左派们求助于国际力量的最后努力，但最终功亏一篑。尽管美国黑人三次向联合国请愿活动都失败了，但它们仍有重要的影响。请愿活动通过把美国的种族困境延伸到国际环境中，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种族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也让海外的美国代表疲于应付，从而清楚地证明国内的种族歧视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推行的致命要害，到1951年底种族问题已变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时苏联频繁地利用种族问题来进行反美宣传和争夺人心，新独立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美国的西方盟友也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声誉因此严重受损。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核心本是促进民主和遏制共产主义，但国际上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这种关注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形象风采不再。美国政府不能再回避或忽视美国黑人的民权问题了，因为它成为关系美国冷战利益的重大问题。联邦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重要的冷战外交利益，逐渐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盟友，这就为后来民权运动和民权改革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于展：《冷战初期美国黑人的联合国请愿活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引证材料

富裕社会中的贫困，成为 60 年代美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在穷人中最多的  
是黑人。他们的贫困更被各种种族歧视所加深。这不能不使黑人群众在 60 年代掀起更大的  
的斗争浪潮。

1961 年 5 月，出现了“自由乘客”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在 1963 年达到高潮。这一年，在南部 11 个州的 115 个城市，发生 930 起抗议示威，迫使肯尼迪不得不改变对民权问题的消极态度并于同年 6 月呼吁国会通过新的民权法。8 月 28 日，25 万黑人和白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集会。马丁·路德·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这次和平集会和示威标志着争取民权的运动日趋壮大。

1964 年以后，黑人斗争逐步走上了武装抗暴斗争的道路。……1967 年美国发生了 128 起种族骚乱。种族主义者加紧了反扑。1965 年 2 月，主张“流血的战斗”的杰出的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尔科姆·爱克斯遇害。坚持非暴力斗争的马丁·路德·金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也于 1968 年 4 月 4 日被种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一事件导致 36 个州的 138 个城市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黑人抗暴斗争。约翰逊政府竟动员正规军近 7 万人镇压黑人。美国统治阶级在采取镇压手段的同时，被迫对黑人作了一些让步。如改善一些黑人区的生活条件，宣布取消种族隔离等，同时注意吸收黑人上层分子进入议会、警察局等部门，还通过所谓“黑人资本主义”来培植少数黑人资本家充当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但黑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点缀，多数黑人仍处在贫困之中。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彭树智本卷主编：《世界史 现代史编 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12，第 325—326 页。

## 史料来源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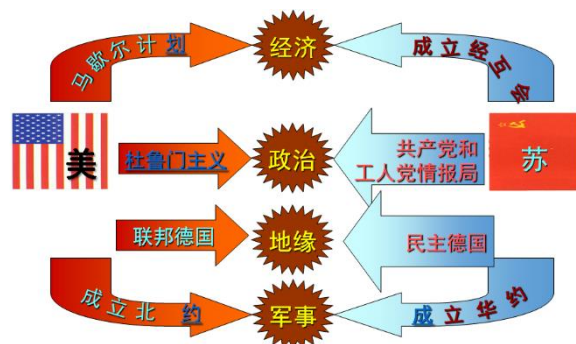
冷战是美国和苏联争夺全球利益和世界影响的斗争，也是它们遏制反遏制斗争所形成的两国关系和整个战后国际关系的一种状态，是1947年至1991年的一种国际体系。冷战是除了美苏直接军事冲突和使用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手段的斗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宣传等各个领域，其一般特点是以军备竞赛、外交斗争、经济压力、意识形态对立、宣传攻击、间谍战等途径造成国际的紧张局势和国家之间的互相敌视和仇恨。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自觉不自觉、程度不同地卷入了冷战。冷战主要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冷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并逐步扩展到整个世界。冷战严重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摘编自刘金质：《冷战史：1945-1991》[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页

## 引证材料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战后美国政府以扶植西欧为中心，由冷战思维所主导的外交决策模式最终确立。这篇以援助希腊、土耳其为旨趣的国情咨文背后，实则彰显了以艾奇逊为代表的国务院外交政策制定团队的思维导向，即美国将不惜一

切代价，与苏联在欧洲及其边缘地区寸土必争；美国加入一场新的大国博弈是必要的，根本目标是为维系全世界各民族的自由。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国情咨文》正式问世。美国总统宣布：“希腊、土耳其的局势关乎美国战略目标和安全；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其一——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美



两极格局是以美苏为中心，在欧洲形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在全球形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格局。

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的颠覆势力施行的征服活动。”

——摘编自王道：《普遍主义的胜利——迪安·艾奇逊与“杜鲁门主义”之缔造（下）》，《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5期

注：杜鲁门主义借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为名，实质上是以控制西欧、遏制苏联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杜鲁门主义也是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开始的正式标志。

### 史料来源 3

麦卡锡主义是 1950 年代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命名的一场席卷美国社会各阶层的“民权侵害”运动，其口号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蔓延”，而本质是以各种法律手段侵害美国公民在“宪法修正案”保障下的人权，为美国民权史和国际人权史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麦卡锡主义是美国近代社会中两大民权侵害事件之一，它是“反共产主义”（西方反共产主义的阶段可分为：第一阶段始于 1917 年十月革命后；第二阶段肇始于 1933 年；第三个阶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第四阶段“反共产主义”思潮的代表就是麦卡锡主义；第五个阶段开始于美国总统里根任期的 1975 年）和“红色恐慌”传统最集中的表现，是西方传统的“惧恨异己”文化意识形态的美国翻版。

1950 年代的最初五年，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图景都笼罩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氛围之中。一位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利用自己在参议院中的权力，以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对美国政府的渗透为名，对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发起捕风捉影的司法调查和政治诽谤，严重侵害了这些人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思想自由权、名誉权和工作权等宪法保障的人权，造成了美国历史上可

与歧视黑人比肩的两大人权灾难性事件之一。与基于种族因素歧视黑人不同，麦卡锡主义触发的人权侵害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即“反共产主义”（anti-communism）

——摘编自单纯：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研究》2020年第2期。

## 小结

二战结束后，美苏在国家战略、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冲突，使他们从战时盟友变为冷战对手，逐渐形成两极格局。冷战影响广泛国内外各方面，如从1946年到1951年，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等黑人民权和左翼组织先后三次发起了向联合国请愿的活动，以引起国际关注，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美国黑人的困境。但在当时冷战反共的气氛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压制，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

## 史料解析

通过以上史学材料的剖析，结合题干史料情境的信息：

“1951年，美国黑人团体民权大会向联合国发起请愿活动，指控美国政府对黑人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美国政府指责请愿活动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寻找支持政府的黑人来驳斥这些指控”，1951年，美苏冷战日益加剧，并日益影响到国内政治等各方面，在新形势下，美国的黑人运动斗争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1951年，美国黑人团体民权大会向联合国发起请愿活动，指控美国政府对黑人犯有种族灭绝罪行以引起国际关注，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美国黑人的困境。但在当时冷战反共的气氛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压制，这些活动都遭到失败。

A项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正式形成，结合所学，1955年华约的成立，标志着两极对峙格局的正式形成，与题干时间1951年不吻合，B项民权大会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材料

的主旨为美国黑人团体民权大会向联合国发起请愿活动以及美国政府的对策，依据所学知识，美国在废奴运动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广泛存在，因此，无论从题干情境还是史实而言，B 项都不相符合；D 项美国政府对国内的种族平等问题漠不关心，民权大会向联合国指控美国政府的种族灭绝罪行后，美国政府在指责的同时还寻找支持政府的黑人来驳斥，这恰恰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国内的种族平等问题的重视与关注，与本题主旨不符合；C 项美国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受冷战意识影响，依据题干，民权大会向联合国指控美国政府的种族灭绝罪行后，美国政府立即将请愿活动与共产主义的宣传联系起来，结合 1951 年前后的阶段特征，此时，冷战日益加剧，美苏关系日趋对立，并日益影响到国内政治。C 项符合题干材料、史实，因此本题选择 C 项。

### 素养考查

本题题干情境重在构建在冷战背景下的美国黑人运动斗争形式以及美国政府的对策，考查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学生需要调动冷战的影响、种族歧视等相关知识，结合题干情境主旨进行判定，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注：本文的选择题解析仅就试题本身的史料来源做个人的解析，仅提供大家参考商榷。本

文是鲍鹭滨史料汇编团队针对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甲卷）做的

史料解析，属于公益材料，对所有同仁免费开放，严

禁有偿转载和盗用收费。



有需要交流可以加鲍老师的微信：尘世微光

## 参考文献书目:

1. 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4.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5.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6.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
7. 朱绍侯、齐涛、王育济著:《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8. 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下册[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
9. 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
11.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
13.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14. 曹顺仙著:《世界文明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15. 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6. 程禹文著:《世界全史·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
17. 王助民、李良玉、陈恩虎等:《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18.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千年经济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20. 【美】彭慕兰著 史健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 【美】斯文·贝克特著 徐轶杰、杨燕译：《棉花帝国》[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22.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下册 [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23. 许永璋：《世界近代工业革命》[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24.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26. 刘金质：《冷战史：1945-1991》[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27. 陈丽萍：《再议唐“十王宅”制度》[J]，《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6—107页
28. 刘家书：《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J]，《阴山学刊》，2020年4月，第33卷第2期，第73页
29. 姚为君：《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第41卷03期，第89页
30. 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J]，《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1月01期，第102—103页
31. 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研究十一》，2020年9月，第380页。

32. 姜维枫：《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9月第5期，第34—35页
33. 曾小忙，江西鹰潭职业技术学院：《由〈释革〉谈梁启超之“变”》[J]，文学教育（下）.2010年第11期，第16—17页
34. 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近代史研究》
35. 孔祥吉：《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05期
36. 茅海建：《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交谊及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37. 刘成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就业观念的变迁》[D]，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第4—7，16页
38.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J]，《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7月
39. 文礼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失败》[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40. 于展：《冷战初期美国黑人的联合国请愿活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41. 王道：《普遍主义的胜利---迪安·艾奇逊与“杜鲁门主义”之缔造（下）》[J]，《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5期
42. 单纯：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研究》2020年第2期
- 注：未标注出处都已经在文段中注明。